



职教改革视域下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优化的内在逻辑与行动路径

吴智峰¹, 蔡硕聪²

(1.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3;

2. 澄海区莲华镇农业水利服务中心, 广东 汕头, 515827)

摘要: 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使得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优化社会服务职能成为高职院校高质量高水平办学的应然之举。在校企产教适配不高、机制运转不畅通、任务导向服务理念错位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下,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社会服务整体水平相对有限。探析从统筹布局提升产教适配度,顶层规划革新科层治理机制,大力拓展特色品牌社会服务等角度优化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实际行动中,通过磨砺教师社会服务综合技能、赋权企业导师创新实践教学权益、提升学生产学研社会服务活动比例等方式,从师创、匠创、学创三方面提升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综合水平。

关键词: 产教适配;社会服务;机制短板;理念错位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2024)06-0038-07

DOI: 10.19899/j.cnki.42-1669/Z.2024.06.007

一、引言

一般认为,高校社会服务肇始于1862年美国依据《莫里尔法案》诞生的赠地学院^[1],确立于“威斯康星思想”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当前,社会服务已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一起成为高校三大基本职能。高职院校作为高校体系中的类型教育,“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办学定位使其更需要深化产教融合,扎根区域经济发展,优化社会服务职能范式。

宏观层面,国家历来重视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

能建设。教高〔2010〕8号文将“社会服务能力建设”作为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教职教〔2019〕5号文将“提升服务发展水平”作为实施“双高计划”的改革发展任务之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单列社会服务考核指标;《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服务产业链、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和区域布局”。系列国家政策表明优化社会服务职能对于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提升社会服务水平是高职院校未来发展

收稿日期: 2024-06-13

基金项目: 2022年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三创’视域下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组织模式与路径优化探析”(项目编号: JT2022YB098)。

作者简介: 吴智峰(1982—),女,福建莆田人,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物流系统优化与控制;蔡硕聪(1981—),男,广东汕头人,汕头市澄海区莲华镇农业水利服务中心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农村发展。

展的必然趋势。

二、政策影响力视域下的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现状

在国家政策及自身综合实力提升的驱使下,高职院校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支援西部、技术服务、信息咨询、社区公益、乡村振兴等社会服务活动,取得优异的成绩,但在社会肯定与公信维度方向有待进一步提升。当前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实践从政策影响力视域可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一) 支撑国家战略层面

支撑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服务产业升级,是“双高计划”释放的重要政策信号^[2]。高职院校对国家战略的支持与推进是其重要社会服务内容之一^[3],主要体现在对内落实教育“对口支援计划”,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外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进职教出海。高职院校高度重视国家战略对接,往往从学校层面统筹规划、调配资源,遴选全校优势专业及中坚力量开展系列支援活动。不少高职院校尤其“双高”院校积极推进职教“援疆”“援藏”等计划;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持续对口帮扶全国15个省、自治区的211所中高职院校转型升级,组团式对口支援建设新疆理工职业大学^[4]。职业出海,教随产出,助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标准、语境等存在差异境况下拥有大量本国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持。职教出海利于地方政府在国际上打造“区域名片”,匹配的政策资金落实相对明确,整体成效显著。如天津“鲁班工坊”、江苏“郑和计划”、福建“海丝学院”等,为中华文化传播及国际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职教力量。

(二) 日常社会服务层面

多数高职院校日常社会服务惯性做法是由各个二级学院凭借专业优势或社会资源自行拓展,学校从业绩考核角度赋予任务指标或给予适当激励,整体缺乏规划协调及机制资源支持。

二级学院开展社会服务可分为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两大类型。学生主体社会服务由学校共青团及学工处协同组织,以大学生“三下乡”活动或青年志愿者活动、社区公益活动为主。学生以青春靓丽姿态活跃于乡村、社区进行系列社会服务实践活动,产生巨大的正向能量及社会影响力。当前学生群体活动普遍与自身专业技能链接不紧密,多数通

过校园学生社团组织遴选成员并以文化传播、卫生整洁、生活帮扶、思想宣传等行为展现。学生活动评价多以签到次数或参加频率为依据,社会服务质量及学生自身能力提升程度难以衡量,部分学生社会服务实践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存在娱乐化、形式化现象,呈现一定的社会服务内容窄化、服务价值矮化表征^[5]。

教师群体社会服务基本依托专业大类,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信息技术支持、电商直播运营、文化技艺传承创新等活动。目前多以个体教师自身社会资源为切入点,带动教师团队少数成员以点状形态开展短期的、一次性服务,具有较强的偶发性、随机性。高职教师个体行为发起的社会服务因社会认知偏见、教师自身实力、学院设施设备等多重因素往往难以接触企业、社区、乡镇等服务对象的核心层面,服务效果呈现一定的表浅化、辅助性特征。部分合作企业甚至为帮助院校教师完成社会服务任务指标,出于私人情感因素专门设置相关项目,反向协助院校社会服务实践活动。当前高职院校教师群体社会服务缺乏系统性长期规划,出现以完成当期业绩考核目标为导向的功利化、短视化行为,社会服务质量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各界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认可度。

三、影响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优化的内在因素剖析

(一) 产教适配低: 高职教师社会服务切入点迷茫

高职院校教师作为职业教育的主导力量,在高职院校社会服务水平整体认可度不高的情境下,师资综合实力首当其冲受到各界质疑。当前高职院校师资准入机制以学历学位为主要考察标准;发展成长以各类集中式理论培训为主体;“双师”认定以笼统评价标准为依据^[6];整体应用研究及社会服务能力确实有待提升。解析高职院校教师成长历程,院校教育系统的自我评价发展体系使高职教师与产业市场需求相对脱节是影响其社会服务能力的深层次原因。

1. 校园相对封闭的自我运转体系是产教适配低的根源

在准入机制上,高职院校资深教师多数经历从毕业院校到工作院校的历程,缺乏社会企业实践经验。新进青年教师受《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2020年起基本不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聘”制约,有一定社会历练但经验相对有限。当前中国高职院校普遍存在师资整体理论水平高于实践操作能力现象。高水平理论综合素养一定程度保障高职院校教师自我约束水平、自主学习能力、分析内化效率保持较高水平。面对新事物、新理论、新态势,同等条件下院校教师能够更快速地学习转化适应成长。高校人才培养使命使其具备一种与社会日常实际问题无直接相关的纯粹追求知识的自我运转体系。长期封闭的“象牙塔”生活使多数院校教师与社会产业保持一种独特的游离状态,即对宏观发展态势清晰熟知,对具体运转经营缺乏了解。教师群体良好的综合素养优势在相对陌生的产业运转体系下,难以准确把握行业企业面临的现实痛点,无法精准定位社会服务应用研究切入点,其高效学习转化优势无法发挥功效。

2. 表浅化的产教融合难以发掘社会服务切入点

高职院校积极落实国家政策,拓展各类产教融合项目,如:设立产业学院、聘请企业导师开展实训课程等。当前在教育公益性及体制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下,企业基本利益动因难以有效驱动,校企合作普遍存在学校热、企业冷的现象。多数校企合作项目以企业参观游学、学生毕业实习为主,教师难以深入参与企业实质运营过程。实训课程基于校园课堂环境安全等多重制衡因素,更多倾向与产业教育科技企业合作,以实验室仿真模拟或相关软件系统操作为主。产业教育科技企业提炼凝结实体企业运营流程与典型工作场景,对于学校日常教学及人才培养有提质增效的作用,但同时也淡化产业企业实际工作真实问题,教师基本不可能在标准的仿真操作或实训软件中找到社会服务切入点。只有花费一定时长深入行业企业一线,真正融入企业生产运营,才能感触产业真实服务需求点,开展行之有效的社会服务活动。

(二) 机制不畅:制度短板限制社会服务主体积极性

高职院校作为社会服务的主体,不论公办民营,基本参照事业单位组织体系运转,注重规范性、稳定性;而行业企业等组织作为社会服务的客体,以适应市场变化为准则,强调实用性、效益性。二者运行机制存在天然的差异,加大了高职院校全面拓展社会服务项目的难度。

1. 泛化运行的科层机制难以适应多样化社会

服务拓展需求

我国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体系普遍以科层管理为基本运转机制。科层制在促进院校管理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同时,也带来权力泛化、异化导致的行政化与官僚化^[7]。社会服务涉及范围广泛,培训、公益、传承、技术、交流、咨询等不同类型项目服务对象千差万别。一些民营小微企业、乡村集体组织等并没有严谨的流程及规范的章程,难以出具符合现代科层管理体系要求的官方文件等佐证材料,导致部分社会服务项目无法立项培育。此外,不同类型社会服务项目的对应科层体系中的科技处、共青团、教务处、宣传部、对外交流中心等部门职责不同,对社会服务的评价认定方式流程各异,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高职院校教师社会服务立项申请及结项认定的难度系数。在激励机制相对有限的情境下,甚至出现教师及团队规避校内繁流程,以个人名义在外拓展相关服务项目现象。以乡村公益宣传为例,部分院校以现场签到名字作为社会服务人次评判依据,使原本纯粹热烈的公益活动氛围蒙上尴尬无奈的行政色彩。科层管理机制的泛化运行与社会服务多样化的组织形态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

2. 高校绩效改革目标压力不利于社会服务项目长期培养

高校绩效改革浪潮下,各项教科研任务以量化具体指标呈现,多数高职院校教师面临“非聘即降”的巨大压力。在当前基本权益没有明确保障前提下,高职教师不愿意也不敢长时间去企业访谈交流或挂职历练以期获得未来不确定的成长。于是集中式快捷理论培训成为许多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首选。“双师”认证通过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及假期下企业等方式满足要求。教师假期下企业具有明显的时间限制,合作企业不可能将重点项目或运营难点交付给仅在企业挂职历练2个月不到的其他组织成员。教师假期下企业接触更多的是重复的标准流程性的表浅工作,可以丰富课堂教学案例,尚未达到社会服务层次需求水平。此外,一般企业在出现超越常规标准难以解决的困惑问题时,并不愿意让其他组织成员介入。社会服务需要高职院校教师基础时间维度保障,以期深层次了解相关项目背景并获取对方组织情感方向认同。当前高职院校绩效考核往往以年为单位量化成果,长期不确定的社会服务项目培育并不适应考核机制,会出现

当期目标考核不达标,教师直接失去参与项目开展资格的场景,导致众多教师因难以平衡社会服务项目培育与当期绩效考核刚性要求而处于两难境地。

3. 企业权益保障难落实限制产教融合型社会服务深入开展

从政策导向上,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助力地方中小微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研发是国家层面对高职院校的一贯要求。产品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测试等项目均需要长时间的持续跟进及不断调试,并承担不确定的市场变化或技术研发失败等系列风险,前期投入成本客观存在,但后期收益却无法保障。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考量,当项目在特定时期内成功概率低于一定水平时,企业更倾向于维持现状的务实选择。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教师普遍承担教学、科研、竞赛、学生管理等繁杂工作,多数处于负荷满载甚至超载状态。教师群体一般利用空余时间与企业沟通交流,又因长期处于与企业一线脱节的“象牙塔”生活,设计的方案或研发的技术往往处于初始状态,仍需要大量实践测试不断迭代优化方能见成效。对企业而言,高职院校不成熟的社会服务可能带来未来不明确的经济收益,但当前需要承担一定的成本支出,特别是化工、制造等产业,前期设施设备投入成本巨大。除有特殊情怀的企业家外,多数企业并不完全认可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供给,更多是响应政策开展签约拍照挂牌等形式宣传的表浅层工作,即我国产教融合普遍存在“学校热、企业冷”的壁炉现象。

高职院校服务企业转型升级本身是一个校企双向奔赴的适应产业市场自身运转渐变特性的“慢变量”过程,前期试错成本客观存在。当前社会实践中往往由企业一方独自承担。《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明确指出针对产教融合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健全“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举措。然而宏观的指导政策在具体落实细节上受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及企业自身经营性质影响,各个省市差异巨大。地方传统产业或小微企业因缺乏宏观政策敏感性而在实践中更易处于政策红利的底层。企业权益保障难以有效落实,限制了企业参与产教融合型社会服务项目拓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三) 理念错位:任务导向理念降低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可持续发展力

数字化时代,“加速主义”大变革背景下,数字

治理、量化指标成为多数高职院校机制运转的基础。工作必须完成特定量化任务理念深入人心。部分院校组织及个体教职工,曲解任务导向理念,走向片面追求当期指标完成率的短视功利行为,不愿意耗费漫长时间精力成本培育提升缓慢成长的专业技能综合实力,不利于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1. 院校组织:任务至上理念不利于院校服务水平综合提升

社会服务虽然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并列为高校三大基本职能,但受传统思维惯性影响,目前多数高职院校工作重心主要为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只是完成“双高”建设或职教改革的任务指标,并未真正意义上将其上升到学校办学定位、使命愿景的高度。多数高职院校缺乏对社会服务功能的顶层设计,未设立专门管理部门进行专业指导和归口管理^[8],更多的是将支撑国家战略之外的日常社会服务以业绩任务形式分派给各二级学院。二级学院在科层机制运转下,再将任务指标分解转达至各个教职员工。社会服务在多数高职院校运转体系中只有任务下达明线,缺乏系统性规划与协调培育主线,整体处于自发散漫状态。教师主体社会服务与学生群体社会服务因分管部门不同而相对割裂;不同二级学院各自为政,跨院系跨专业联合开展社会服务概率较小;难以发挥学校资源整合优势。同时,受任务指标完成率影响,部分高职院校管理层更倾向于支持易完成、见效快的社会培训、公益宣讲、政策咨询等社会服务;对于周期长、不确定结论的产品改良、技术创新等项目,往往初期保持观望态度,等到确认相对成功概率时才给予相关资源支持,缺乏对教师社会服务专业水平提升的长期栽培与持续增长理念,致使部分有潜力的社会服务项目未能有效开展。

2. 师生个体:社会服务理念模糊导致短视功利主义盛行

部分高职院校师生群体自我发展意识不强,社会服务理念模糊。虽然认同社会服务可以反哺专业成长、提升学术研究水平,但始终认为校园应以“象牙塔”知识探索为主,社会服务等实践活动可以在学生毕业后通过实习工作等活动顺应人生成长规律自然实现,当前只作为校园知识探索的辅助性活动。对于社会服务项目,部分教师群体带有接触产业、完成业绩考核的功利性质,学生群体则带有

体验生活、轻松休闲的潜在情绪,尚未意识到社会服务对促进专业革新、产业升级的重要意义及自身的责任担当。高校通过科研项目带动社会服务拓展是本科院校常见方式,但高职院校科研实力相对有限,多数教师难以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纵向课题,横向课题受社会传统偏见影响同样难以获得重量级项目。高职院校通过科学研究带动社会服务水平短期内迅速提升的可行性较小。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定程度上推进专业发展与社会服务的有机融合,但在功利短视理念影响下,多数高职教师倾向于从学生群体中挖掘现有家族产业进行孵化培育,以期快速获得明显成效,缺乏专业技能积累沉淀的毅力及长期回报社会的服务意识。

四、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优化的内在逻辑与行动路径

产教适配低、机制运转不畅通、社会服务理念错位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高职院校社会服务整体水平。产业链与教育链适配度不高加剧高职院校组织、个体社会服务认知理念偏差;持续提升社会服务整体水平的长期理念缺失,使得短期任务导向的功利意识盛行;高职院校管理层缺乏对社会服务深层意蕴与现实定位的正确认知,在科层管理机制中遵循规范化、标准化运转规则,再次放大产教融合难度与教职工社会服务认知偏差,导致高职院校社会服务持续发展提升的良性循环体系难以形成。

(一)顶层规划、产教适配:高职院校社会服务提升的内在逻辑

1. 统筹布局提升产教适配度,大力拓展特色品牌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类型多样,从19世纪中期美国赠地学院运动到我国现在职教改革浪潮,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只有融入区域产业经济运转体系并对社会进步提供有实质价值的供给服务时,才能获得各界认可与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也是系列国家政策关注的职教改革属性要义。高职院校应当与区域社会形成命运共同体,社会服务应当主动适配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教师个体团队自发拓展的社会服务影响力有限,难以驱动区域特定产业链变迁运转体量,需从学校层面统筹布局,结合学校现有资源,分析对接区域主要产业,调整现有专业方向,提升整个学校产教适配度,主动联系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打破学校自我封闭的“象牙塔”运转体系,接触行业

企业真实运营现状,从产学研共生角度开发可持续发展社会服务项目。通过深入对接一个产业供应链需求,带动多个专业群聚合发展,搭建社会服务开放平台,让不同要素禀赋因聚焦同一现实问题而展开协同行动,鼓励学校师生从专业技能角度主动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服务企业转型升级,在校企共生共长中打造社会服务特色品牌。

2. 顶层规划革新科层治理机制,平衡校企长期发展目标

机制作为组织运行的规范与导向,具有流程上的合理性与顺应性,是组织成员交流协调及利益博弈的准则。高职院校社会服务涉及不同性质的合作群体,不同组织运转机制存在较大差异。作为社会服务提供者的高职院校,应当主动关注并考虑当前客观现状下自身与服务对象之间存在的短期目标需求与长期发展的矛盾冲突,主动调整相关服务机制,减缓不同组织合作交流的障碍阻力。高职院校可优化顶层设计,积极探寻科层机制标准化管理与类型多样社会服务之间的平衡点。建设专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结合学校发展规划设置相对合理的分阶段的中长期的考核目标,给相关社会服务项目培育成长留有足够的时间长度。在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全面发展初期,可适当简化内部审核流程,营造相对宽容的认可激励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教师工作量认定、学生学分转化、项目配套资金等方面给予更多的保障。针对不同类型社会服务采取不同政策,如:前期资金成本投入较多重工、制造等产业,合理制定项目补助扶持机制,协助企业申报地方相关产教融合优惠政策,保障合作企业基本权益。

3. 机制改良助推长效服务理念推广,整合资源优化服务能力

提升社会服务水平,助力区域经济增长是高职院校作为类型教育的本质属性要求。高职院校管理层应从理念上高度重视社会服务作为高校基本职能的应有之义,树立长效社会服务理念,在行动上以一种主动、务实的姿态适应社会服务多样化形态。理念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从内心深处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但其转变是一个受外在政策、经济、科技等多元因素影响而缓慢渐变的过程。高职院校积极正向的社会服务激励机制借助行政线性高效的执行力度全方位推广应用,加速学校师生长效服务理念认知度。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专门

机构可以从学校层面高度,对内协调整合各二级学院不同专业间可互助互补的相关资源,形成与当地产业链发展相匹配的多专业服务集群,优化校内社会服务综合能力;对外主动对接行业协会、企业等组织机构,积极引入社会服务项目,转变纯粹管理审核机构为引导参与组织,使学校社会服务在运转机制上有切实可靠的组织保障,而非处于自发无序状态。通过典型社会服务项目宣传及改良社会服务机制的实施,让师生在可预期的希望中转变短视功利意识为长效社会服务理念。

(二)师创、匠创、学创: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优化的行动路径

1. 师创:搭建产教适配平台,磨砺教师社会服务综合技能

教师作为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主力群体,当前存在技术技能经验相对匮乏的客观现状。教师假期下企业或实训实践活动的间断性、表浅性不能满足企业项目运营的连贯性及教师技术技能成长的延续性要求。教师只有长时间深入企业一线,将“象牙塔”的理论知识融合于实践应用,并内化更新,才能发挥自身分析归纳研判的素养优势,提供有效社会服务。

高职院校应当承认当前教师群体存在的技能难以满足企业需求的产教适配不高现象,主动对接合作企业,搭建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综合平台,如产业学院、教师流动站等。学校可对参加综合实践平台技术技能锻炼的教师适当减免工作量。通过教师自主申报、院校审核认定的方式,以年为周期,由学校协调到对应的行业企业跟岗锻炼实践,并接受企业规章制度约束。借鉴德国“双元制”实施法则,如:教师2天在校3天在企业等方式,调适校企工作平衡点,配对企业导师,接受企业系列任务安排及相关考核评价。通过长时间维度的一线实践提升教师实践操作技能,弥合“象牙塔”隔离带来的社会服务迷茫点,从产学研共生角度提升社会服务综合实力。

2. 匠创:规范让渡机制,赋权企业导师创新实践教学权益

企业导师具有丰富的一线岗位工作经验,熟悉产业发展状态和专业技术操作,明晰企业技术痛点或经营难点,可对高职院校开展高效社会服务提供针对性建议或实用性方案。在现有校企合作表浅化机制下,多数高职院校企业导师为客座聘任式导

师,即学校开展实践实训活动时,聘请企业导师介绍基本工作流程或演示设备仪器标准操作方法,往往以天为单位结算劳动报酬。多数企业导师自觉将产教融合视为兼职一部分,自身定位为第三方参与者,配合高职院校完成当天任务安排,缺乏积极主动性,不会思索探讨产教融合落地施行的深层次问题与矛盾。

高职院校可拓展企业导师长聘专项制度,对于部分校企合作实训平台项目,探索权益让渡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导师熟悉行业运转优势,由企业导师主导实训实践平台运作,校方起辅助协同作用。在规范机制保障下,校企双方协商建立企业权利清单制度,夯实企业导师育人主体地位^[9]。打破学校传统教学模式,赋权企业导师主导设计权利清单中的实训项目教学内容,推进基于工作场景实践的教学改革创新改革落实。结合校企实训项目规模及合作时间,切实提升企业导师经济待遇,激励其工作积极性与职业认同感,引导企业导师主动探索工作中的痛难点,发掘产学研共生下的社会服务突破点,为高职院校服务产业企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

3. 学创:优化专创融合育人模式,提升产学研社会服务活动比例

高职院校学生群体参加社会服务活动主要活跃在青年志愿者活动等公益层面,与所学专业关联度不强,更多展示学校育人风貌。学生以技术技能为纽带开展专业关联度强的社会服务比例相对有限,当前主要通过“挑战杯”“创青春”“互联网+”系列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链接相关社会服务项目,借助赛项推进获取学校团队、行业专家、社会资金支持,加深与地方产业深度合作,服务乡村振兴及区域经济发展。在大赛层层筛选淘汰机制下,学生参与比例相对有限,且受短视功利主义及专升本、毕业工作等多重因素影响,长效社会服务模式难以大范围复制推广。

高职院校可以按照三年学制培养规划,分阶段有计划地普及长效社会服务理念。大一通过通识课程、课程思政熏陶社会服务意识,大二在系列技能训练、竞赛实践中激发创新创意思维、强化专业技能服务社会能力,大三在企业实习、就业实践中磨砺社会服务综合实力。高职院校普及长效社会服务理念,有利于从全校学生范围发掘孵化优质创新创业项目,拓宽与区域产业经济的接触面,准确定位社会服务切入点与着力点,凝聚学校师资力量,

有针对性地联合企业导师共同开展产学研创活动,充分发挥企业专家熟悉行业行情及技术设施设备优势,提升高职院校社会服务项目落地实施概率。从共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推进校企产教融合深入落实,构建长效社会服务运转机制。

参考文献:

[1] 杨光富,张宏菊.赠地学院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0):8-11.
 [2] 高志研.“双高计划”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9n/2019_zt8/zjjd/201904/t20190424_379349.html,2019-04-09.
 [3] 王子寅.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实践现状与发展策略[J].职教

通讯,2022(6):18-24.
 [4]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官网.学校简介[EB/OL].https://www.szpu.edu.cn/xxgk/xxjj.htm,2024-03-03.
 [5] 方宇鹏,戴启培,徐洪武.以技能提升为核心的“一课一地、能劳耦合”劳动教育改革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9):168-172.
 [6] 彭友,施莎莎.高职院校教师应用研究能力的现状、困境与提升策略[J].教育与职业,2022(22):79-84.
 [7] 吴一鸣.科教融汇推动下高职院校校科研平台建设的逻辑理路[J].职业技术教育,2023(10):25-30.
 [8] 孙凤山.社会服务功能对高职院校社会认可度的影响研究[J].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报,2022(6):23-28.
 [9] 肖凤翔,王珩安.权利保障:突破校企合作“壁炉现象”的企业逻辑[J].江苏高教,2020(9):105-110.

[责任编辑:陶济东]

The internal logic and action path of social service optimiz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view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Wu Zhifeng¹, Cai Shuocong²

- (1. Fujian Chuanzheng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uzhou, Fujian, 350003, China;
 2. Chenghai District Lianhua Town Agricultural and Water Conservancy Service Center, Shantou, Guangdong, 515827, China)

Abstract: The orien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makes it necessary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integrate into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ptimize social service functions. The overall level of social servi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is relatively limited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he low adapta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the unobstructed operation of mechanism and the borrowing of task-oriented service concep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o optimize the social service abi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verall layout to improve the suitability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top-level planning to reform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bureaucracy, and vigorously expanding the social service of characteristic brands. In practical actions, through sharpening teachers' comprehensive social service skills, empowering enterprise mentors to innovate practical teaching rights, and improving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social service activities,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social servi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improv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eacher creation, master creation, and learning creation.

Key words: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daptation, Social Service, Mechanism Shortcomings, Concept Dislocation